

内蒙古工商史料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三十九辑

内蒙古工商史料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内蒙古工商史料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三十九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8.375 字数：210千
1990年12月第一版 印数1—5000

前 言

《内蒙古文史资料》先后在多本选辑中发表过反映近代内蒙古工商业发展的史料，但尚未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辑。为了更充分地反映内蒙古工商业的发展历史，更全面地向有志于内蒙古工商史研究者提供资料，出版了这本专辑，今后计划陆续出版若干同类专辑。我们殷切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本专辑主要汇集了戊戌维新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粮食、饮食、旅蒙商等行业的部分资料。通过这些行业的发展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原绥远省各阶层的生活状况。由于稿源有限，在本专辑中反映我区东部地区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资料较少，争取在以后的专辑中补充刊出。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聘请王敬章同志做了大量整理、编校工作。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奇天祥副主任终审。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在编辑工作中会有不少缺点和疏漏，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0年11月23日

目 录

归化城粮店史话	贾汉卿	(1)	
归化城的六陈行	贾汉卿	(19)	
回忆丰镇县的粮店	乔学曾	(31)	
丰镇县城六陈行营业状况	李晋湘	(40)	
归化城“食店行”的变迁和经营管理	刘映元	(46)	
“烧麦馆子”与本地点心铺	张玉美 马昇	裴宽 刘映元	(78)
“葫芦馆子”与“饸饹馆子”	郝有根 董芝荣	刘映元	(92)
“东路馆子”与其它东路饮食业	南奉三 贾生福	刘映元	(101)
归化城的厨师和“堂倌”	刘映元	(112)	
包头的食店行	荣相如 刘耀	(129)	
辛亥革命前后丰镇县城的饭馆和糕点铺	乔学曾	(145)	
包头的旅蒙商	刘世纯 任秀	(154)	
从旅蒙商祥泰隆的兴衰史看阿拉善旗的社会经济变化	博尔济吉特·达遵	(173)	
管盟历史上的行商与蒙民自赴商埠	王维龙	(184)	
我在“集生祥”皮毛牲畜店的经历见闻	张岐山	(196)	
我国西北皮毛集散重镇包头的皮毛行业	武生荣	(215)	

归化城粮店史话

贾汉卿

清代初叶，归化城的粮店，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塞外市场的形成，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帝国主义商业侵入后，凭借着较大的资本，操纵了粮食市场，不时以买空卖空的形式，垄断了人民生活的主要资料。为揭露粮食的本质与资本主义商业的一切活动，经过多方面的访问，兹将搜集所得资料，叙述如下，聊作参考。

一、归化厅的垦务与粮商

辽阔无边的敕勒川，原为蒙古民族的游牧地。康熙时期，清廷为了开拓塞外，戍守边陲，曾迁送部分战俘，由坝州西来，编充庄头，首先在浑津、黑河服役垦殖，所有收获一律充作粮饷。相传已久，人多称之为八旗粮地与庄头地。清代中叶，入耕汉民，也多纳粮承种，每年以半数产粮交纳官府，因此一般人又称做大粮地。其它的蒙旗垦地，即由各厅同知衙门代征租金，世世成例，又称之为小粮地。

由于拓垦的粮地面积逐步扩大，所以农业生产比较活跃，社会环境有所变迁，浑津、黑河庄头地的农户获得丰收。蒙汉人民为了互通有无，曾以食粮皮毛作为主要的交换商品。这时，杀虎口等处的商民，为了换取粮食与皮毛，不断携带百货，前来交易，接触频繁，遂有小型集市出现。

入耕汉民激增后，由于日常生活的需要，一些加工粮食的小

磨坊开始出现。乾隆时期，右卫一带的粮商，集资前来，进行农产品的贩运活动，由于交易额的不断上升，粮食市场，逐渐在塞上青城占有一席之地。

二、归化城的粮店简史

乾隆二十年（公元1725年）左右，塞外各地，普遍丰收，右卫粮食商号德泰店，为了获取厚利，以日用百货作不等价交换，开设了永泰粮店。以后，杀虎口的茂家面铺，又开张了庆丰粮店。它们为粮行的兴起起了先声作用。

嘉庆与道光时期，归化城仅有义顺粮店等三四家。咸丰年间，河运畅通，托克托厅的河口镇，已成为塞上的新兴码头，晋西陕北一带的粮商，纷纷前往，进行交易。当时归化厅、莎拉齐厅与包头镇一带的产粮，大部分集中河口，运往河堡营、碛口等地，每年不下二三百万石，其中以小米为大宗，相传有年。曾有“不怕北不收，只怕南不通”的谚语。可见当年塞外的产粮，曾以晋西晋北与陕北为最大的销售市场。

同治中叶，归化城的粮店，又有兴隆店、统泉店与天荣店三家。光绪初年，祁县乔家曾在上棚子街开设了德兴粮店，同时太谷孙家投资的汇丰店，莎拉齐厅西盛永分设的西盛店，也都先后开张。经过了一个时期，归化邦死马行暴发户薛家的万盛店、李厨子家的元亨店、万恒店投资的万成店，土默特旗森暴领所开设的永德店、代州帮的致远店、武川小五号地张家的德和店以及复茂店、崇致远店、天泰店、瑞成店、世兴店、销成店等，此起彼伏地先后出现。

宣统时期，归化邦赵姓投资兴和店与大义店、义丰店等，也曾相继开业活跃市场。辛亥革命后，归化厅改名为归化县，原有的部分粮店，因受到时局的影响，宣告歇业。新开张的字号，计有德盛店、丰隆店、丰泰店、瑞时店、天德店、大益店与源聚店

等。

民国10年（公元1921年）左右，祁县乔家在武川所开设的大德店迁移来绥，并将汇丰店接办。德茂店由忻州邦张家改组，易名为聚丰店。义丰店只由天裕享、复盛元投资，改称为裕源公店。经过了一个时期，永德店由绥远商会会长兼筹饷局局长邢克让接办，改名为天元公店。晋北镇守使张汉捷投资的粮店，继称为义丰店。丰镇县资本家麻全忠所开设的粮店，叫做德丰店。

京绥铁路通车后，京津一带的粮商，逐渐西来。当时曾有合顺公司、积成公司、天亨粮栈、公记粮栈、天成粮栈与除西成等十余家，先后在崔家沙梁开张营业，承办粮食运输，同时四河口的码头，也移往包头。粮食的输出，就更见频繁。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阎锡山所设的官粮店，曾将天德店接收，改名为元丰粮店，由李纯美任经理。抗战前夕，全市的粮店，计有天荣店、德兴店、西盛店等十三家。

日伪时期，原有的部分粮店宣告歇业。新开张的粮店有义和店、福泉店、德盛店、丰盛店等四五家。嗣后因粮食统制，不堪维持，除老牌字号如天荣店、西盛店、德兴店等继续存在外，大部分转业或倒闭。抗战结束后，鄂友三曾开张义盛粮店，广和公、协成、天德元等粮店也先后出现。解放前夕，归绥市计有一家粮店。

三、归化城粮店的内部组织与分工

当年归化城粮店分柜房、斗房、伙房、车房、下夜房五种组织分工。

1、柜房：是粮店的首脑部分，也是经理全盘业务的指挥机构。每年的营业计划，都由它按照市场情况与气候的预测，作出决定。一般粮店，在大、二掌柜（即正副经理）领导之下，凡是

身顶优股的人员，按其身股多寡、经验能力的大小，给以相当的职务。柜房设有坐柜房的与坐客房的下级掌柜共三五人。坐柜房的负经理日常营业的责任，坐客房的负责联络招待各地投宿在本店的粮主粮商，与之进行交易，以和气生财为目的。柜房内设管帐的四至五名，一般人称之为先生。粮店的帐薄，分粮帐、钱帐、小帐与凭帖帐四种。除小帐与凭帖帐外，粮帐与钱帐都有流水与老帐之分。每天出进的粮食品种，粮主粮客的交易成数，都由管粮帐的详细记载。管钱帐的，必须将每天收支过按的粮钱，先过流水，后登老帐，晚间收市，总计小结。另有一位管小帐的，每天将粮主、粮客借用或代拨付的钱项，在未结算粮款之前，请准坐柜的先行支垫，暂行登入小帐，总结时，再行清理或转帐。凭帖帐是将每天本店所印的钱帖，收入付出，查点对据，如遇伪造，随时查究。站庭子的下级掌柜的职务是当各处粮车入店后，指示青年柜伙（当时叫做住地方的），将粮主迎入客房，殷勤招待。将随行车信引向伙房，伙以茶水，力求安排适当，尽到东道主的职责。粮店在营业当中，为了了解市场情况，设有跑街的专业人员一位或两位。每天早晨，他们到钱市和所有的粮店及范围较大的六陈行，调查出进粮食的数量和价格，作压等压价或提等提价以及抛售囤积的准备，行情的变化，都以跑街人员所搜集的情况为依据，起到了耳目作用。

2、斗房：斗房是粮店的手足，也是粮店的灵魂。设主管人员一人，主二人，他们的地位相当于本地的二掌柜和三掌柜，人称斗房头儿。在每天的营业当中，凡是粮食的出进，都由他们定质评价，其它如过斗、入仓、倒仓、保管、曝晒、高收、低收，即由住斗房的从业人员负责。过斗以后，掌斗码者高声喊出，向柜房报帐，管粮帐的先生一一记载。登帐完毕，得向报帐人重复对证，免有错误。这就是管粮帐先生的硬工夫。斗房头儿须有鉴别粮质的经验和能力，一般掌握斗码的斗房人员，都有一套欺骗手

段，所以有一些粮主，为了减少亏损，往往给他们暗送小礼，叫做酒钱。因为他们常有这些收入，所以一般人投身于粮店的斗房车房，是非常不易的。

3、伙房：一般粮店的伙房，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剥削。他们在大二师傅的领导下，有打外杂、打内杂与肉案、面案等内部分工。凡店内人员的伙食，由管理伙房的店员，依照柜房的规定标准，如有招待宴会以及各种应酬与节日，必须准备酒席，一切开支，由柜房负责。对外类似饭铺，每天由打外杂的向店内住宿的客面请示饭菜，随时食用。应收的价格，不能高于市面。但饭菜所需要的米面调料，往往向本店挪用，或作公开的窃盗。既能取利客商，又可剥削本店。那时大二师傅的工资，每月仅有满钱五百，但卖饭所得所有利润即由大二师傅与打外杂的平均分配，本店柜房不加过问。打外杂的，招待客人同时，还承揽赌场、代购鸦片，抽头打赏，也是一项意外的收入，倒粮时，粮主给予的各种馈赠，更是难以预计。所以当年粮店的打外杂，是一个难得的肥缺。

4、车房：车房是粮店的运输机构。当年归化城的大小粮店，为了盘运粮食，都设有车房。车房有头儿一人，所有的骡车马车与车倌，都由车房头儿来管理，每天出车前后，饮喂骡马、打扫槽圈，都由他来负责。一般的车倌，除了在归化城内拉运外，每年秋后，还有不少地主通知粮店，前往各地会同临时雇用的车辆，将新收的粮食，分批向粮店集中。这都是当年粮店车房的任务。入店拉粮的车辆，也由车房照料，饮喂牲畜等事，指定看后院的代为负责。那时一般车倌每月的工资，仅得城钱五吊，车房头儿多赠五吊，看后院的为两吊。车房头儿因兼办倒斗，另有一些意外收入。一般车倌，多在远途运输粮食时，以和土搅沙的手段，将粮食盗取，作为补贴。看后院的在照料外来粮主的车马时，也能窃取一部分草料，顶替出售。

5.下夜房：一般粮店的下夜房，归斗房管辖，雇用夜信二三人，每晚看守前后大门，往来巡视，严防偷盗与意外。因为他们月工资仅为城钱两吊，所以冬天所需用的皮袄、毛鞋，完全由粮店供应。有时他们在巡更下夜时，也将本店的部分饲料卖给外来的车信，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各粮食住宿的商客，因时出闲游，每至深夜，才迟迟而归，夜信为了得到一些零星小费，不辞辛劳坐等门户的启闭，很为辛苦。

粮栈以承揽粮食运输为本行，经理人员多为河北籍，它与铁路部门，有密切的联系，内部组织简单，并无斗房、车房的设置，只有押运伙友随车往来，起运手续，多同于客货栈。

旧社会，一般粮店所定的铺规极为严厉，所有的柜伙与各级掌柜，在入店之初，必须具有殷实铺保作为保证。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三年之内，每年仅得城钱五吊。凡捧茶倒水，铺床叠被、打扫庭堂，应对进退，都由少年柜伙担任。当年粮店的制度，与其它行业相同，也是在铺长制的情况下逐级服从。

各家粮店的资本并不一致，最多者为白银一两千两，最少者仅有城钱五六千吊。从业人员，多则可达一百二三十人，最少只有四五十人。

四、归化城粮店的经营

清代初叶，因货币缺乏，归化城仅有几家粮店。多以布匹百货与各地乡农进行不等价交易。嗣后商务繁重，限于行业的规划，才专营粮食，并发行凭帖，作为资本的流动。

乾隆时期，因交通不便，归化城的粮店不向外地贩运粮食，曾有千里不贩粮的谚语。它们的营业范围只限于新城与旧城之间。嘉庆与道光时期，因粮价稳定，归化城的粮店，呈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六陈行与旅蒙商发展较快，出境的白酒，不断增加，一般粮店所囤积的杂粮，大部分销售于缸房，作为酿酒的服

料。莜麦、小麦即多出粜于六陈行。

咸丰年间，杂粮与谷类大量南运，本地粮店与河口粮店有所往来。粮食的价格也略有提高。

同治初年、塞外欠收，当时的几家粮店囤积居奇，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光绪三年，旱灾严重，而有些粮店，却遇到了发财的机会。庚子以后，洋行西来，它们在掠夺各种物资的情况下，也介入粮行，使粮价不断起伏。

辛亥革命后，官僚资本已见萌芽，又因币制庞杂，钱商作祟，粮价更是日日不同。

清代中叶、归化城的粮食市场，虽然间有赌博式的粮盘交易，但大多数殷实粮店，仍以仓存的殷实作为后盾，防止以空卖空的赔累。

民国初年，包头粮商如广生德等，为了暴发横财，纷纷前来联合“相与”（常来往的商号）大做粮盘生意。

归化城的粮店，自将全市粮食市场掌握后，出现了“买树梢”（即农民春季急于用款，向粮店借支银钱货物，以新种青苗庄稼作抵，议定极低的价格，到田禾收割后，照议定的价格数量交粮）的剥削勾当。

当年归化城由各粮店输出的，每年约计50万石。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京绥铁路通车后，因粮栈开张，不断东运，输入输出的粮店形成了相互增长的趋势，较之以前，高达五至六倍，可谓粮食业的极盛时期。在那个时候，归化市的各种行业，如钱铺、饭馆、土店、货栈等受到了粮行的煽动，也不断地贩粮外运，追求暴利。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冯玉祥部向西撤退，全市粮店损失的粮食，约达十余万石。民国十六年冬，晋军离绥，奉军东来，人吃马喂，悉数由粮店支垫，原有的积存，消耗大半。

民国十八年，绥远各地大旱，禁粮出境，河套的糜子，虽然每石仅售现洋一元，但因运输困难，形成滞销。在那个时候，归绥的粮店，曾由京津一带与宣化、大同等地区贩运面粉与杂粮，利润三倍，也给粮商们创造了发财的机会。

民国二十年，塞外各地普遍丰收，粮价下降，出现了谷贱伤农的现象。当时的一些粮栈，根据外地的需要，将所有的粮食东运，取得一些利润，后因晋钞贬值，金融混乱，也遭到了相当的损失。

1932年，元丰粮店开业，它为了操纵粮食市场，曾借用政治力量，在归绥商会设立粮市，逐日开盘，做以空卖空的交易。后因同业反对，没多长时间，自行停业。

日伪时期，因粮店代收官粮，故以出九入十一的手段，串通乡长，从中渔利。后因粮食统制，检查出境，所有的粮栈，大部分转业为货栈，延及抗战结束。不长时间，这些货栈也纷纷歇业，全部倒闭。

日寇投降之后，归化城的粮店又活跃起来，当时，葫麻、小麦禁止出境，但粮商利用社会关系与金钱，贿通粮政机关，取得运输执照，奇货可居，商人大发横财。

1948年夏季，法币贬值，商界混乱，粮价风涨，一日三变。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停滞状态。经过一个时期，市面流通现洋、法币与金元券贬值为六百万元折合现洋一元。在那个时候，形同废纸的金元券，仍不断地由飞机运来，作为地方当局的军费与政费。但对一般人民，早已失去了通行的作用。所以在市场紊乱的状态中，曾有“飞机一响，洋钱就涨”的谚语。

1949年春，地方当局令绥远省银行发行兑换银元的货币，停止金元券的通行。但因银根奇紧，一般黑市的利率，竟达十二分左右，以致粮价下降，一落千丈。成为多年来未有的现象。

北京解放以后，绥远的局势逐渐和缓。归绥市的粮店不断地

将武川、托县等处的粮食用胶轮车运往旗下营一带，换取物资与现洋。解放后，一般粮店，即遵照国家政策，从事经营，并在南柴火市设立交易所，按公共价格，在粮食公司的领导下，保障市民供给。

五、粮店的剥削形式及与其他行业关系

由于传统习俗相沿，一般人称那些具有较强垄断性与剥削性的行业为三上行，当时的粮店，就是三上行中的一行。

清代市场上使用的计量是由官府鉴定的。每斗的容量相当于公堂上设置的签甬18倍。当时使用的标准斗，叫做官斗，容量为30斤，容量较小的斗，叫做市斗，又叫做栏相斗，它的容量仅有26斤。清代末叶，官斗与市斗，根据市场的情况相互使用。民国十八年，度量衡一度改革，但是积性难移，仍以过斗的手法，在内入外出时，予以巧妙的剥削。

斗码计分两种，一种是以木板制成，叫做硬码，过斗时叫做“硬趟子”；一种是以硬木杆所制，四方形状，一般人都叫软码，过斗时叫“软趟子”。硬码多由乡间农民使用，归化城的粮店一律采用“软趟子”。当粮店斗房以“软趟子”过斗时，一出一入，就有区别。粮主到粮店买粮，倒斗的斗房头儿，已将粮食用练就手法倾入斗内，再将软码子轻浮过来，每斗即可余粮二合；出粮仓时，做“软趟子”的又将手掌竖立，嵌入斗梁。一经过码，无形中又可余粮二合，一出一入，每斗共得余粮四合。每天过粮收市，所有余粮归粮店所有。这种无代价的余粮，当时叫做折粮。如果粮主存粮入库，每年除向粮店交付草绳钱、圈子钱（共计铜钱三文）外，还要预扣耗粮二合。辛亥革命后，草绳钱与圈子钱一律改为现洋一分。中途转卖倒主，仍得按倒除粮收费。如存粮时久，每年即以过伏为期限，每过一伏，再加耗粮两合。这样连续盘剥，归根到底，都要通过粮价，转嫁于消费者身上。

上。

佣费是粮店的一项最大收入，粮食的一入一出，一经过帐，买主卖主，都得交付佣费二分五厘，以后增至三分。

粮主存粮概不付息，但如折钱存入钱行，每斤约可获利八厘至一分二厘，如贷给面铺，竟可得利一分五厘。这就充分显示了上三行粮店的剥削性。

归化城的粮店，自将新旧二城的粮食掌握后，农村经济即被操纵。自清代谱拨币制实行后，一般钱铺的营业与周转，多依赖于粮店，当时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农民的一切开支都由粮店来转价。所以粮食的交易，早成为归化城的一大市场，而经济周转，即多以粮价为基础。光绪末叶，洋行东来，帝国主义经营的商业，凭借着各种侵略手段与雄厚的资本，以至货币体制有所变更。辛亥以后，官僚资本已见萌芽，绥远各地因军阀骚动，土匪横行，农业生产大受影响。原由粮店操纵的农民经济，即行解体，它的周转过拨，又多仰于钱行。

基于上述原因，旧社会的粮店，也是钱行剥削的对象。遇有粮价波动，一些钱铺往往串通粮店，作囤积压奇的勾当，从中渔利。另外一般粮店在粮食入店时，先由粮店斗房评价，然后经面铺碾房，尽量地选购过斗，剩余部分即归盘粮店，代存入仓。所以当年的六陈行，是粮店的最大顾主。

自洋行来绥，粮食的价格逐渐上升。当时的隆昌洋行、会丰轩饭馆，日盛和毛店、通盛和面庄等，也都出入于粮食市，做投机存盘的交易。粮店的接触广泛，说明了它与其它行业的关系。

六、聚锦社及几位有名的粮店掌柜和斗房头儿

在清代中叶，归化城的粮店曾与货店业共同组织聚锦社，办理两行的内外事务，对日常贸易也有一些详细的规定。每年阴历六月二十五，按例献戏于南茶访关帝庙，豪华铺张，一次竟用掉

城钱七千五百吊。平时社务由总领负责，他们协助四大乡耆与当地官府进行联系。光绪时期，天荣店掌柜徐仲华、西盛店掌柜李枝荣、万盛店掌柜刘培景都担任过乡耆的职务。其他如张祥麟、任茂源等曾任总领。辛亥革命后，货店业另行组社，与聚福社的性质有所区别。国民党统治时期，聚锦社改名为粮店业同业公会，曾由义丰店掌柜张汉臣担任理事。日伪时期，改组为粮食业公会，德兴店掌柜张云亭任会长，会内设职员5人，办理摊派差粮的事务。日寇投降后，粮食业公会又进行改组，先后由德丰店经理田宽、大德店经理陈思任理事长。解放以后，所有的同业公会都宣告结束。

光绪初年至民国时期，曾有几名粮店掌柜与斗房头儿操纵了粮食市场，当时名气很大，现将他们的主要活动简述如下：

(1)刘培景，山西左云县人，万盛店掌柜，曾任乡耆。学徒时期，根据民间相传的有关气候方面的谚语，随时体验，尚能预测天气变化。当时一些粮店在粮食的抛售存仓与价格的升降上，多以他的预测为标准。他为了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曾物色了一些青年柜伙，进行培养，作为接班人。辛亥革命后，大同人杨玉福继承了他的职务。

(2)姚智与徐仲华：天荣店掌柜姚智，归化厅本塔村人，具有吃苦耐劳的特性。曾在二掌柜徐仲华（归化厅刀刀板村人）的帮助下，克勤克俭，为本店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3)任茂源：德兴店是山西祁县财主乔家所开设。光绪中叶，曾由祁县人任茂源担任掌柜，他曾凭借着雄厚的资本与包头复字号以及法中庸、大德店、德兴长面铺的支援，大耍粮盘，暴发横财。极盛时期，每天进出的粮食，竟达一千五六百石。三年结帐，每股生意（山、陕帮习用的语汇），可分红利银三千两，可称为粮店中的多财善贾者。

(4)张祥麟与李枝荣：光绪四年，德兴店的营业已见发达，

当时张祥麟与李枝荣（山西崞县人）在该店担任相当的职务。这年冬，萨拉齐镇西盛永粮店为了与德兴店在粮食市场互见雌雄，就串通了张祥麟与李枝荣，让他们在营业畅旺的季节突然辞职并拨给资本，另行开张了西盛粮店。当时，德兴店的营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此德兴店就采取了永远不用崞县人的办法。西盛店开张之后，先后由张祥麟、李枝荣担任掌柜。李枝荣是个能干的粮西，曾被推选为归化城的乡耆，他在张祥麟奠定的基础上，使粮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辛亥革命后，又由定襄县人刘明道继承了李枝荣的职务。他们在营业中，都以一脉相承的稳步前进办法，活跃于粮食市场。

(5)崔庆福：山西省忻州人，善于交际。宣统三年，兴和店创立的时候，他担任掌柜。开业那天，他利用酒席招待主顾，四乡农民闻讯前来，云集的骡马牛竟达七八百，过斗的粮食近千石。从此他就逐渐操纵了粮食市场。

(6)周达德：山西崞县人，曾任万成店、瑞成店、义丰店的掌柜，为人素守信誉，诚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气魄。当他接办义丰店的时候，股东贺和厚因他不善应付，曾表示反对，后经其他股东解释，才得以经营，后仍以守信于人得到同行业的拥护。

(7)朱善积，山西忻州人。因其头脑突出，一般人称其朱大头。他担任永德店掌柜时，曾以蛮干手段，不计利害，常要虎盘。虽互有赔赚，仍能取得财东森家的信任。此人很具冒险精神。

当年归化城粮店著名的斗房头儿，计有李峰、张三与张正理三人，他们各有特点，兹将其经历事迹，概述如下：

(1)李峰，西盛店的斗房头儿。山西省崞县人。他具有“软趙子”过斗的手艺，每年积余的农粮，将敷本店的开支。同时能够鉴别川底（即土默川）与后山粮食的户地。在同行业中，有